



穿皮大衣 的马利亚

KÜRK MANTOLU MADONNA

麦当娜·西碧·史密斯·阿米莉



穿皮大衣的马利亚

〔土耳其〕萨巴哈丁·阿里著

曾宪英 唐鹤鸣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穿皮大衣的马利亚

Chuan Pidayi de Maliya

〔土耳其〕萨巴哈丁·阿里著

曾宪英 唐鹤鸣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102,000 开本：787×1092 $\frac{1}{3}$ 印张：5 3/8 插页：2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000

责任编辑：赵春润 责任校对：马玉德

封面设计：李勤学

统一书号：10158·756 定价：0.57元



Sabahattin Ali

作者小传

萨巴哈丁·阿里 (Sabahattin Ali 1907—1948)

土耳其小说家。军官家庭出身。师范学校毕业。后去德国留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德国革命运动。回国后任语文教师，并从事文学活动。初期作品受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后因结识了希克梅特等作家，逐渐转向现实主义。1933年由于写了一首讽刺总统的诗，被监禁十个月。他在狱中与共产党人和农民接触，写下了许多反映农民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其中著名的有短篇小说集《磨坊》(1935)、《呼声》(1937)和长篇小说《孤儿优素福》(1937)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发表的长篇小说《我们心中的魔鬼》，因揭露了为德国法西斯效劳的文人的丑恶面目，书被焚毁，直到战后还被列为禁书。二次大战后创办幽默杂志，发表政论、寓言、讽刺诗，鞭挞出卖祖国的反动派，因而再度被捕入狱。获释后被迫脱离写作生活，靠当搬运工糊口。后逃亡国外，在过境时被暗杀。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 I

迄今为止我所遇到的一切人当中，拉伊夫先生给我留下了可算是最深刻的印象。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剩下我独自一个人，拉伊夫先生那白净的面孔和在陌生人面前的那种慌乱的神态，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特殊人物。他这人很普通、没有明显特点，如每天擦肩而过的上百个人一样，对于他我们都不会多看一眼的。在他的一生中，我们了解和不了解的各方面，也确实没有什么使人感兴趣的东西。

我认识拉伊夫先生完全是偶然的事。

我本来在一家银行里当一名小职员，后来被解雇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解雇，只是告诉我为了精简人员。可是过了个把星期，我的位置上又安排了人。我在安卡拉找工作找了很久。明知不会有什结果，可我还是经过了许多次就业考试，而每当通知我没有被录取时，我仍然一次一次地感到难过。从朋友们那里也得不到什么消息，连到商店去找个营业员的工作，也只能得到否定的答复。我常常绝望地在街上游荡到深夜。

有一天傍晚，我在从车站到展览馆的僻静路上慢慢地走着，深深地呼吸着安卡拉美妙的秋天的空气，想使自己

乐观一些。夕阳反照在人民宫的玻璃窗上，为这座白色大理石楼房增添了多彩的斑点。洋槐树和小松树上方升起了阵阵烟雾。从那个建筑工地下班的工人们默默地走过来，他们穿着破衣烂衫，显得疲惫不堪。柏油路上留着不少汽车轮胎的痕迹。这时候，一辆小汽车从我身旁飞快地驶过。我抬头一看，觉得车窗里的那张面孔似乎很熟悉。小汽车嘎然停住，车门打开了。我的中学同学哈姆迪探出头来招呼我。我走了过去。

“你上哪儿去？”他问道。

“不上哪，随便走走。”

“来吧，到我家去吧！”

没等我回答，他就把我拉上了汽车。原来，他是从他们公司所属的工厂里回来。他说：“我已经打电报告告诉家里我要回来，可能他们已经准备晚饭了。否则我就不敢邀请你了。”

我笑了。

从前我经常看见哈姆迪。可自从我离开银行以后，就一直再没有见到他。听说他是经营机械、林业木材的一个公司的副经理，赚了很可观的一笔钱。

“你还在银行工作吗？”他问。

“不，我不在银行了。”我说。

他很惊讶：

“那现在在哪儿呢？”

我很不情愿地回答：“闲着呢！”

他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看了看我的这一身穿戴。

看样子，他并没对请我来作客后悔。他微笑着，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说：

“今晚咱们谈谈，想想办法。”

看得出来，他很满意自己的生活状况，也很自信，似乎他真有能力帮熟人的忙。我很羡慕他。

哈姆迪住在一所小巧别致的房子里。他有一个长得不太漂亮但却很讨人喜欢的妻子。他们当着我的面，无所顾忌地拥抱和亲吻。哈姆迪撇下我，径自洗澡去了。

由于哈姆迪没有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我不知所措，呆呆地站在客厅中间。他妻子也站在门旁打量着我。她考虑了一下，大概是想说“请坐”，但是后来又觉得没有必要，就悄悄地走了出去。

我在想为什么哈姆迪这样把我扔下？他这个人从来都不马虎，什么事都做得很仔细。这已成为他严格遵守的准则，也是他生活上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有地位的人的一个特殊习惯，大概就是在他的老同学和比他地位低的同事面前显示出一点有意识的疏忽；然后，对那些本来一直称呼“您”的同事，突然改称呼为“你”，并表现出谦逊而又慈祥的样子。有时打断对方的话，问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并且很自然地、多少带着怜悯的微笑和你交谈。近来，这些我见得太多了，以至于我都没想到要生哈姆迪的气。我只想默默地离开这里，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但是这时候，一个系着白围裙，包着头巾的老妇人一声不响地端来了咖啡。我在一把雕花的扶手椅子上坐下，环顾了一下周围。墙上挂着家庭成员的和电影明星的照片，书架上摆着

几本小说和几本时装杂志。茶几下横七竖八地放着几本画册，好象被客人虐待了似的。由于我无所事事，于是也拿起了一本。还没有等我翻开，哈姆迪已经进来了。他用一只手理着湿头发，另一只手扣着衬衣扣子。

“哎，怎么样，谈谈你的情况。”他说。

“没什么……我已经说过了。”

看样子，他遇到我很高兴。可能这可以显示一下他地位的高贵，或者是为他自己的境遇而庆幸。

“你写些什么东西吗？”他问。

“有时候写点诗歌、短篇小说什么的。”

“有用吗？”

我笑了笑，没有作答。

他说：“别搞那些玩意儿了，亲爱的！”他接着讲述了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才能取得成功。他大概从来没有想到有人会回答他这些话，有人会和他争论这些问题。他象诱导孩子们一样地说着，毫不掩饰他自己的成功，才以这种姿态来谈话的。我实在感到他很傻，我脸上带着那样的微笑，惊奇地看着他。我的这副神态，似乎更促使他高谈阔论了。

“明天早晨，你到我那里去吧，”他说，“咱们来想办法。我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你要更勤奋才好，但是这并不重要。生活中，贫困能教会一个人很多东西……别忘了，早点来见我！”

他说这些话，好象忘记了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是最懒惰的人之一。也许他相信在这里我不会揭他的老底而使

他难堪，所以才这样大言不惭。

他欠了欠身，我很快就明白了。我把手伸了过去，说：

“请原谅，我该走了。”

“为什么，亲爱的？还早呢……”

我本来忘记了他请我吃晚饭的事，这时候我倒想起来了。可是看样子他也完全忘了。我走到门口拿起了帽子。

“请向夫人致意！”我说。

“好，好！你明天来找我，不要不好意思，亲爱的！”说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天已经黑了，路灯都亮了。我走到外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虽然带些尘土，但我觉得特别清新。我慢慢地走着。

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到哈姆迪的公司去了。昨天晚上我离开他家的时候，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况且他也没有说一定能怎么样，只是说“咱们想想办法”。这种话我听惯了。往常我去求人的时候，好心的主人就是用这样的话来打发我走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找哈姆迪去了。

公务员先带我到一个小房间等候。当我走进哈姆迪办公室的时候，我感到他还是昨天那副样子，我有点后悔了。

哈姆迪面前堆了一大叠文件，有一大群职员来来去去地忙碌着。哈姆迪点头示意，让我坐在一张椅子上，又继续忙他的事情了。我甚至没和他握手就坐到椅子上了。

等房间里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的同学抬起了头。

“我给你找了一个工作。”他说着，用神秘的眼光看

着我。“这项工作还是我想出来的，活儿并不太累。你就在几个银行里，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银行里来回走走，可以说象是公司和银行之间的联络员。闲的时候，你就坐在办公室里，干你自己的事情，写写诗呀什么的。我和经理说过了，我们发聘请书。但是暂时还不能给你太多的薪水，四、五十个里拉，以后当然会增加的。好吧，就这样。祝你成功！”

他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就把手伸了过来。我走过去，道了谢。由于帮了我的忙，他的脸上表现出很得意的神情。我想，他这个人本来不坏，只是因为他的地位要求他这样做，而且，可能这样做也确实是必要的。当我离开房间到了走廊里的时候，我犹豫起来了，是到他告诉我的办公室去呢，还是离开这个地方？我慢慢地走着。碰到我第一次遇到的那个公务员，我向他打听了翻译拉伊夫先生的办公室，那人用手朝一个房门指了指就走开了。

我开了门，看见拉伊夫先生坐在里面。尽管我以前不认识他，可是一看到坐在桌子后面低着头的这个人，我就感到不会是别人。哈姆迪对我说过：“我让他们在德文翻译拉伊夫先生的房间里为你放了一张桌子。他是一个不声不响的老好人，他不会妨碍任何人的。”听了这样的介绍，我就想象拉伊夫先生可能是一个长着灰白的头发，戴着玳瑁眼镜，胡子拉碴的人，而正好这个人很象，我就毫不犹豫地进去了。他抬起头，毫不在意地望着我。

“您是拉伊夫先生吗？”我问道。

他审视了我一会，然后用轻轻的，似乎有点胆怯的声

音说道：

“是的，我就是。您大概是新来的职员吧？他们刚才给您准备好了办公桌。请吧，欢迎您！”

我走到椅子跟前坐下。我想按照习惯，和一个陌生人面对面坐着的时候，总要偷偷地观察一下自己的同伴，取得初步的——当然往往是错误的——印象。但是，我看到他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愿望。他继续埋着头忙自己的事情，好象房间里根本没有我这个人似的。

一直到中午就这样呆着。我已经可以大大方方地盯着对面坐着的这个人了。他头发剪得很短，头顶开始秃了，脸上和脖子上有许多皱纹。细长的手指翻动着稿纸，毫不费劲地翻译着。有时，象是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词汇，才抬起眼皮。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很不自然的微笑。虽然从侧面看去，他显得很老，可是他的脸上，特别是在他微笑的时候，有一种使人感到惊奇的天真的表情。修得短短的两撇小黄胡子，更显示了这种天真。

到该吃午饭的时候，他也没有离开座位。只见他打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用纸包着的面包和一个旅行饭盒。“祝您好胃口！”说着我离开了办公室。

我们已经面对面地坐了好几天了，可是几乎没有谈过话。我和其它办公室的许多人都已经很熟了。我从这些人那里得知，拉伊夫先生是公司里最早的职员之一。在这个公司还没有成立以前，他就是现在和我们这个公司有联系的一个银行里的翻译。他什么时候到那里的，谁也不知

道。听说他家里人口很多，他的薪水刚够维持生活。当我问到“他资格这么老，公司为什么不给他增加工资”的时候，年轻的职员们笑着说：“他是个傻瓜，他究竟懂不懂外语还值得怀疑！”到后来我才知道，他德文掌握得很好，翻译得既准确而又漂亮。比如，从南斯拉夫苏萨克港来的关于白蜡木和冷杉木的木材分析，或者关于枕木钻孔机样式和零件的信件，他都能轻而易举地翻译出来。从土耳其文译成德文的委托书、合同等，公司的经理连看都不看就发了出去。闲下来的时候，他就打开抽屉，埋头看书，但并不把书拿出来。有一天，我问道：“你看的是什么书，拉伊夫先生？”他好象做了错事被人抓住了似的，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没什么，一本德文小说。”说着赶紧把抽屉关上了。尽管如此，在公司里谁也看不出他懂外语。可能他们是对的，因为从外表上看，他确实不象一个懂外语的人。在谈话中，从来也不会从他嘴里听到一个外文词，什么时候也没听他自己说过他懂外语，而且从来也没有见过他手里或口袋里带着外文报刊杂志。有的人总喜欢吹嘘：“我懂欧洲语言！”而拉伊夫先生一点也不象那种人。他不想靠他的知识来增加薪水，更不想找别的赚钱多的工作，就证实了这一点。

他早上按时来上班，中午在办公室吃饭，晚上买点东西就回家。虽然我几次请他去喝咖啡，他都没有同意。他总是说：“家里等着我哪！”我想他一定是个幸福的父亲，总想早点回家看见一家老小。后来我才知道根本不是那样。关于这一点，以后我还要讲到。他虽然一贯这样勤

奋，可是在公司里还是免不了受别人歧视。我们的哈姆迪，就常常抓住拉伊夫先生译稿中小小的打字错误，把这可怜的人叫去，有时甚至直接跑到我们办公室来大发雷霆。哈姆迪知道，拉伊夫先生向来谨小慎微，更不敢得罪那些得势的年轻人。所以哈姆迪才这样虐待他。为了一篇翻译稿迟误了几个小时，就可以暴跳如雷，吵得全办公楼都听得见。

拉伊夫先生时常生病，不来上班，往往是轻微的感冒。他说几年以前他得过胸膜炎，所以他非常注意，稍稍有一点感冒就躲在家里。出门的时候，要穿上几件绒衣，在办公室从来不开窗户，晚上下班时，脖子上要围上围巾，把耳朵遮住，再穿上厚厚的旧大衣，不把领子竖起来是不能走的。但是，即使在他生病的时候，也没有耽误工作。需要翻译的稿子，只要送到他家里去，几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取回来。尽管这样，可经理和我们的哈姆迪是怎样对待拉伊夫先生的呢？他们似乎想说：“你看，我们对你多好啊，你虽然病着，我们还是没有开除你。”他们甚至多少次当面奚落他。他几天不来上班之后，一来，他们就用刻薄的语言问这个可怜的人：“怎么样，你还有完没有完？”

渐渐地，我也开始对拉伊夫先生有看法了。我不常在办公室里，总是带着公文包到各个银行，到和我们签订合同的机关去。只有在整理公文，准备向经理或副经理汇报的时候，我才坐在办公室里。可是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真使人怀疑他是否还活着。他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或

者翻译东西，或者看他抽屉里的“德文小说”。他的确是一个死气沉沉、枯燥无味的人物。我想，对于他来说，任何人的任何要求都不会反对。如此沉默，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的人的生活，和植物又有多少区别？他象一台机器一样，每天来上班，做他的事情，按照我所不能理解的习惯读一大堆书，晚上买点东西就回家。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能生病是仅有的变化。据同事们说，他从来就是这样生活的，谁也没有看见他激动过。即使是来自上司的无理指责，他还是那样冷静地听着。他每次把译好的稿件送去打字，或者把打好的稿件取回来的时候，也总要说一句毫无意义的“劳驾”或“谢谢”。

有一天，完全是由于打字员轻视拉伊夫先生的缘故，翻译的稿件耽误了一点时间。哈姆迪就到我们屋子里来了，用非常生硬的口气喊道：

“你还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我和你说过，我有急事，我要走了，可你，匈牙利公司的来信还没有翻译出来！”

拉伊夫先生赶忙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翻译完了，先生。是打字员小姐们还没打出来，她们有别的事情。”

“我没和你说过吗？这一件比所有的都急！”

“是的，先生，我也是这样和她们说的。”

哈姆迪嗓门更高了：

“你有回答我话的工夫，不如去做我让你做的事情！”说着，把门一摔就出去了。

拉伊夫先生也只好再次哀求打字员去了。

我还在想着哈姆迪刚才那副凶暴的样子，拉伊夫先生回来了。他低着头坐到座位上，脸上还是那种安祥的神态。他拿起一支铅笔开始在纸上画起来。他没有写字，而是画了好些线条。他那小黄胡子下面的嘴角上带着自信的微笑。手在纸上缓慢地移动着。他不时地停下来，眯缝起眼睛向前看着。从他脸上那不太明显的微笑里，可以看得出他很满意自己所看到的东西。最后他放下笔，久久地欣赏着那幅画。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的脸上出现了完全异样的表情。我惊呆了：他的神情完全象一个债主。由于好奇，我坐不住了。正当我要站起来的时候，他起身到打字员那里去了。我马上跳起来，一个箭步跨到对面的桌子跟前，抓起了拉伊夫先生刚才画的那张纸。一看，惊得我目瞪口呆。

在巴掌大小的一张纸上，我看到了哈姆迪。在拉伊夫先生简单却很熟练的线条里，有着哈姆迪的全部特征。我不能找到任何一点象别人。如果有人看见哈姆迪刚才在这间屋子里大吵大嚷的那副样子的话，那他一定不会认错的。他象野兽一样在发怒。张得大大的嘴巴，两只眯成一条线的眼睛，一直伸到两颊的两个肥大的鼻扇，使他的面孔显得更加粗野……是的，这就是几分钟以前站在这里的哈姆迪，更确切地说，是哈姆迪灵魂的写照。但是，使我惊奇的根本原因还不在于此。我到公司来以后的这几个月里，对哈姆迪作过互相矛盾的评价。有时候我尽量原谅他，有许多次我又嗤之以鼻。我把他本来的性格和现在他的地位所赋予他的性格混淆在一起了。后来我竭力想把它们

区分开来，但是怎么也办不到。拉伊夫先生只用几笔就勾画出来的这个人，正是我长时间以来一直想象着而没有看到的哈姆迪形象。他整个脸上充满着粗野蛮横的表情，但是又有点可怜的样子。我还从来没见过把凶暴和可怜如此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十年来，我今天才真正认识了我的老同学。

同时，这个画像也突然向我真实地展示了拉伊夫先生。现在我才理解他的沉着、冷静以及他和人们相处时那种奇怪的腼腆的原因。对于这样一个对周围的一切都很了解，能明察别人内心世界的人，还有什么可以使他激动，还有什么可以使他生气的呢？我们的一切忧愁，委屈，气愤，都是由于对面前发生的事情感到突然或不理解所造成的。一个对一切都有思想准备，知道别人会怎么样的人，怎么可能惊慌呢？

拉伊夫先生又有使我感兴趣的东西了。拿在我手里的画像线条之清晰，说明这绝非出自一般的绘画爱好者之手。能画成这样，一定需要很深的功夫。这不是冷眼一看就能画出来的，这是要有对看到的一切都能清楚地表达出来的技巧。

门开了，我本想把手里的纸赶快放到桌子上，但来不及了。拉伊夫先生拿着匈牙利公司的来信译稿向我走来。我带着歉意说：

“画得非常好……”

我以为他会惊慌失措，会担心我告发他的秘密。可完全不是这样。他还是带着象平时一样的微笑，从我手里把

那张纸拿了过去。

“好多年以前，我曾搞过一段时间绘画，”他说，“偶而顺手画点什么……您看见了，没有什么意思……”

他把那张画揉成一团，扔进了字纸篓。

“打字员小姐急急忙忙打出来的，”他嘟囔着，“很可能有错误。不过如果我再看一遍的话，又要耽误时间，惹哈姆迪先生生气了……他是对的，我给他送去吧！”

他又出去了。我目送着他的背影。“他是对的，他是对的。”我自言自语地说。

从这时候起，拉伊夫先生的一切，甚至连那些真的没有意义的、无关紧要的动作都使我感兴趣了。我利用一切机会和他交谈，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看样子，他并没有察觉到我这样过分和他接近的目的。他对我彬彬有礼，但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之间的友谊表面上无论怎样发展，但他心灵的大门却始终不肯向我启开。当我对他的家庭，以及他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有所了解之后，对他也就更感兴趣了。而越是接近他，遇到的谜也越多。

我第一次去他家，是在他一次生病的时候。哈姆迪想让秘书送去一份第二天要用的稿件。

“给我吧，我顺便还可以看看他。”我说。

“太好了……你看看他怎么样了，这次病得时间太久了。”

真的，这次他病的时间比较长，已经一个星期没到公司来了。秘书告诉我，他家住在伊斯梅特帕沙区。那时正值隆冬季节，天黑得早。我顺着一条坎坷不平的窄马路向